

高教动态

2018年第2期(总2期)

发展规划处(高等教育研究所)

2018年4月19日

本期要目

【政策摘录】

《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摘录与述评
教育部印发《高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

【高教信息】

全国高校新增2311个专业
教育部公布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名单
教育部将2018年定为教育系统“调查研究年”
2018年俄罗斯教育许可和认证将全面实行网上审批
英国教育大臣提出新措施改善教师工作量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6位科研人员获得欧盟最高科研基金1400万欧元资助

【高校动态】

西湖大学正式获教育部批准设立
南京市与南京大学校地融合对接项目签约
复旦大学成立国家“珠峰计划”首个前沿科学中心
北京大学成立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专家视角】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大学定力体现在对育人的坚守
国科大党委书记张杰：推进研究型、互动型教学思政课改革

【综合改革】

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二重逻辑与路径选择(1)

【政策摘录】

《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摘录与述评

2018年2月，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央编办印发了《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采取切实措施建强做优教师教育，推动教师教育改革发展，全面提升教师素质能力，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经过5年左右努力，办好一批高水平、有特色的教师教育院校和师范类专业。与高校相关的内容如下：

一、师德养成教育全面推进行动。将师德教育贯穿教师教育全过程，作为师范生培养和教师培训课程的必修模块。

二、教师培养层次提升行动。引导支持办好师范类本科专业，增加一批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引导鼓励有关高校扩大教育硕士招生规模，适当增加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三、教师教育改革实验区建设行动。支持建设一批由地方政府统筹，教育、发展改革、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编制等部门密切配合，高校与中小学协同开展教师培养培训、职前与职后相互衔接的教师教育改革实验区，带动区域教师教育改革。

四、教师教育学科专业建设行动。鼓励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自主设置“教师教育学”二级学科，加强教师教育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

五、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构建行动。出台《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启动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将认证结果作为师范类专业准入、质量评价和教师资格认定的重要依据，并向社会公布。建立高校教师教育质量自我评估制度。建立健全教育专业学位认证评估制度和动态调整机制，推动完善教育硕士培养方案。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

《行动计划》以提升教师教育质量为核心，以加强教师教育体系建设为支撑，以教师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动力，力求从源头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教师教育振兴发展的目标是，经过5年左右努力，办好一批高水平、有特色的教师教育院校和师范类专业，教育培养培

训体系基本健全，为我国教师教育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黄晓玫：

《行动计划》吹响了推进师范院校改革的集结号，明确提出要重点建设一批师范教育基地，改革师范生招生制度，提高师范生生源质量，适时提高师范专业生均拨款标准，深入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建设一流师范院校和一流师范专业，鼓励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参与师范人才培养等。

（摘编自 2018 年 3 月 29 日中国教育报）

教育部印发《高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教育部日前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的通知，提出三大类18项重点任务加强人工智能领域专业建设，强调推进“新工科”建设，形成“人工智能 X”复合专业培养新模式。要求：优化高校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体系，包括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核心关键技术创新、加快建设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基地、加快建设一流队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加强高水平科技智库建设、加大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力度6项具体任务；并提出要推动高校人工智能领域科技成果转化与示范应用。

（摘编自 2018 年 4 月 16 日教育部官网）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

近日，《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发布，将作为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自2018年6月1日正式实施。《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是面向我国英语学习者的首个英语能力测评标准。它依据我国英语学习者能力的实证数据，同时充分考虑各学段的需求，将学习者的英语能力从低到高划分为“基础、提高和熟练”三个阶段，共设九个等级。量表以语言运用为导向，构建了多层次的指标体系，对各等级的能力特征进行了全面、清晰描述。

（摘编自2018年4月17 日教育部官网）

【高教信息】

全国高校新增2311个专业

教育部近日公布的2017年度高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显示，全国新增备案本科专业2105个，新增审批本科专业206个，合计新增2311个专业。新增专业中，“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机器人工程”等专业热度最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网络空间安全”及各类小语种专业等也较为热门。另有241个专业被撤销，51个专业调整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成立于2017年5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此次新增备案本科专业最多，达17个。该校另有新增审批本科专业3个，分别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财政学和金融学。

（摘编自2018年3月26日澎湃新闻）

教育部将2018年定为教育系统“调查研究年”

近日，中共教育部党组印发《关于在教育系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意见》。教育部党组决定把2018年作为教育系统“调查研究年”，推动在教育系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写好教育“奋进之笔”。

调查研究有哪些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求真务实，坚持“调”“研”并重，坚持与时俱进。

从哪些方面开展调查研究：紧扣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开展调研，坚持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开展调研，紧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展调研，紧扣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开展调研，紧扣增强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开展调研，紧扣增强教育发展活力开展调研。

（摘编自2018年3月26日微言教育公众号）

教育部公布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名单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的通知》，认定612个项目为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我校黄俭根教授主持的《基于卓越人才培养的地方高校工科专业建设升级探索与实践——以井冈山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为例》获批。

（摘编自2018年3月30日微言教育公众号）

2018 年俄罗斯教育许可和认证将全面实行网上审批

据俄罗斯教科督察署网站 2017 年 11 月 23 日报道，教科督察署在 2018 年将全面实现高等教育机构教育许可和教育认证工作的网络化办公。未来高校和科研机构仅需登录信息平台逐项填写信息和上传文件即可参加教育许可或教育认证活动，高等教育机构也可通过信息平台查看办理进度和取得电子版教育许可或认证证书。为此，教育管理部门将修订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制定网上审批操作规范，建立信息平台 and 提供安全保护措施等。教科督察署表示，全面实行网上审批将改变评估专家的工作方式，促进评估流程的优化并节省评估活动的支出。

（摘编自 2018 年 4 月 4 日世界教育信息）

英国教育大臣提出新措施改善教师工作量

英国教育部消息，教育大臣达米安·海因兹（Damian Hinds）认为首要任务是确保教学始终是“最有价值的工作之一”。她表示，将推动建立聘用教师工作团队和专业团体的策略，以多种方式吸引和留住最具潜力、最优秀的毕业生；与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区域学校委员、教育和技能资助机构以及多学院信托合作，明确各自的角色，并确保教师和学校领导人清楚地了解他们负责的对象和原因；不在小学设置新的考试或评估，也不会对国家课程、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或英国普通中等教育教育文凭考试的高级程度考试（A-level）进行更改。

（摘编自 2018 年 4 月 3 日中国教育报）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6位科研人员获得 欧盟最高科研基金1400万欧元资助

近日，六位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科研人员赢得了欧盟最有声望的“蓝天”项目资金奖励，该项目资助金额高达1400万欧元。每位教职工最高获得了高达250万欧元的资助，以促进他们在化学，糖尿病和哮喘等领域的研究。欧洲研究委员会这份总价值6.53亿英镑的项目将

使欧洲269名高级研究人员收益。这些资助将让他们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最有创意的想法，并可能产生将会对科学，社会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结果。帝国理工学院是这个项目最大的资金接受方之一。

（摘编自 2018 年 4 月 13 日青塔网）

【高校动态】

西湖大学正式获教育部批准设立

近日，西湖大学正式获教育部批准设立。西湖大学是一所由社会力量举力、国家重点支持的非营利性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由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举办。

按照“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的办学定位，西湖大学以博士生培养为起点，适时开展本科生教育。学校近期（五年）规划全日制在校生规模为 1220 人，长期（十年）规模为 5000 人。学校坚持发展有限学科，以大学筹建依托主体——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的生物学、基础医学、理学、前沿技术四个研究所为基础，组建生命科学学院（含生物学和基础医学）、理学院、工学院，优先形成理学、医学、工学等三个门类 12 个一级学科，今后随着大学的发展，适时设立人文社科学院和相关学科。学校面向全球选聘具有较高学术造诣或学术潜力的领军人才和青年科学家，实行与国际化接轨的长聘准聘教研人员聘任体系。

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设立监事会、顾问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等，形成教师治学、民主管理、社会参与的大学治理体系。同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同步设立中国共产党西湖大学委员会，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学校办学治校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学校办学经费来源主要为举办者出资、办学收入、竞争性科研项目经费及人才政策支持经费和政府扶持资金等渠道，日常运行经费主要由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承担。

（摘编自 2018 年 4 月 2 日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网）

南京市与南京大学校地融合对接项目签约

2018年3月29日，为深入实施南京市创新发展“121”战略，大力推动南京建设创新名城和校地融合发展，支持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南京市与南京大学校地融合对接项目签约活动举行。中科院院士、校长吕建指出，此次签约的11个重点项目涉及新材料、医学、光电等领域，同时作为深化学校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学校还将成立产业技术研究总院负责产业化研发、校地校企合作、支持建设新型研发机构等。吕建表示，南京市启动的“两落地、一融合”工程是开展校企融通创新的有力抓手，南京大学要加快探索一条具有南大特色、人才和技术双要素转移的创新之路，为南京的创新发展打造“南大模式”。

（摘编自 2018 年 4 月 2 日南京大学新闻网）

复旦大学成立国家“珠峰计划”首个前沿科学中心

复旦大学“脑科学前沿科学中心”日前获得教育部批准，成为国家“珠峰计划”首个前沿科学中心。“珠峰计划”全称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是教育部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的精神而制定实施的有力举措，重点建设在国际“领跑”的前沿学科。复旦大学脑科学前沿科学中心将瞄准脑科学国际前沿，凝聚全校脑科学与相关学科力量；创新体制机制，构建跨学科、开放的脑科学研究平台；以前瞻性、战略性、前沿性脑科学基础研究为主线，形成脑科学研究的优势方向和国际领先的重要突破，推动新型类脑芯片研发以及类脑智能技术的医学转化应用；建立跨一级学科的脑科学人才培养新模式；建成国际一流的脑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

（摘编自 2018 年 4 月 12 日复旦大学新闻网）

北京大学成立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4月12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揭牌仪式暨学术研讨会举行。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讲话中指出中国正经历由一个区域性国家

变成世界性国家的重大转折期，需要更加关注世界、了解世界。这就要求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都要为国家和世界的发展提供学术支持和人才支撑。北京大学在外国语种、外国历史等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基础依托学科上拥有明显的优势，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北大确立了包括区域与国别研究在内的三个重点交叉学科领域，将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整合学术资源、调整学科布局的契机和平台，为国家提供战略咨询。

（摘编自 2018 年 4 月 13 日北京大学新闻网）

【专家视角】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大学定力体现在对育人的坚守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日前表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大学要坚守育人初心，加快“双一流”建设，努力为国家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邱勇指出，高等教育正在面临重大变革，大学要在变革中保持定力。大学肩负的使命在不断增多，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到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但育人始终是第一位的，大学的定力就体现在对育人的坚守。世间上百年名校无非育人，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大学必须牢牢坚守的初心。清华正在进行综合改革，最终落脚点还是在育人。2017 年设立的“清华大学新百年教学成就奖”和“清华大学年度教学优秀奖”，建立了“开放交流时间”制度，都是在努力营造倾心育人的氛围。清华大学还确立了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着力培养学生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精神。大力开展创意、创新、创业“三创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让学生富于创意、善于创新、勇于创业。

（摘编自科学网）

国科大党委书记张杰：推进研究型、互动型教学思政课改革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张杰为国科大本科生上了一堂题为《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张杰以物理学家的思维，从问题出发，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以世界范围的对比和大时间跨度的史料与数据作为分析推理的基础，引导本科生分析 5000 年来中华民族形成的文化基因，1840 年以来中国人民所做的道路选择，十八大以来新时代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以及十九大之后青年一代的使命担当。张杰一向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2017 年 3 月担任国科大党委书记以来，他一直鼓励教师结合国科大学生的特点创新教学方法，以开放的视野和创新的思路探索推进研究型、互动型教学改革，让课堂真正“实”起来、“活”起来、“动”起来，让学生喜欢。

（摘编自科学网）

【综合改革】

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二重逻辑与路径选择（1）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作出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总体部署，明确了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和核心任务，即以提高质量为发展主题，以优化结构为主攻方向，以深化改革和依法治教“双轮驱动”构建有效支撑质量提升的治理体系。2014年上海市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率先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2017年3月，教育部等五部委又颁发了《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但改革实践中出现了冰火两重天：政府和高校行政高歌猛进，高校师生冷眼旁观；主流媒体与必有目的之人高喊“将教改进行到底”，大部分高校内部仍然“黎明静悄悄”。面对这一现象，张应强呼吁，综合改革需要对高等教育改

革进行改革。那么，综合改革怎么会出出现“隔靴搔痒、隔岸观火”的局面?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是什么?到底要改什么，怎么改?

一、管办分离:综合改革的逻辑起点

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究竟要改什么?从高等教育专家言论和各省市有关高校综合改革方案与实践来看，大家对改革内容的理解并非一致。例如，李立国认为，综合改革的突破口是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促进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曾天山认为，综合改革的突破口是考试招生，这同时是教育内涵发展的重要途径。程海波认为，从高校内部进行，应该是高校深化改革的使命、意义和路径所在。评价机制与高校内部改革是综合改革的应有之义，但是否是突破口还有待商榷。综合改革涉及政府、高校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没有政府和高校的改革，评价机制的改革还不足以使综合改革取得突破，高校内部的改革同样没有了前提和基础。周川梳理了我国20多年的高等教育改革政策，得出的结论是改革目标偏移、改革对象模糊、改革主体缺位、改革路径不明。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十分明确指出，综合改革并非面面俱到，而是对高等教育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全面深化改革。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问题由来已久，自1985年以来，一直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初步确立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二级分权管理的格局。20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重点改革办学体制，逐步建立以“政府主体、社会参与”的共同办学体制。进入21世纪，《规划纲要》和《决定》中均明确指出，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推进专业评价，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这些改革实现了一定规模增长，甚至在特定时期和某些领域有力促进了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这些改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政府主导的强势推动，这非但没有破解我国高等教育历久弥坚的历史遗留问题，还引发了一些新问题。在政府主导的资源分配和评价制度框架内，高校对政府依然存在高度依赖

性，办学自主权仍未有实质性进展，独立办学的主体意识、活力要素远未得到有效发挥。

综合改革已进行4年，但改革目标与预期效果相去甚远，主要表现在：第一，政府学校法律关系没有切实落实；第二，社会参与高等教育治理路径仍然不明；第三，高等教育评价与监督体系尚未形成；第四，高校内部治理结构还未健全，行政化倾向严重；顶层治理构建中同时存在权力本位、越位、缺位、错位怪象；董事会(理事会)有名无实；学术委员会软弱无力，学术权力空心化，没有决策功能；大学章程等制度推进缓慢，高校内部运行充满权力惯性。“教育改革关键首先是体制改革，让大学独立自主地按照教育自身规律来办好教育。”高校长期以来被视为政府的下属事业单位，政府主要通过行政管理手段和行政命令的方式领导和管理高校。这势必造成高等教育难以问责，失去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政府的越位、缺位、错位现象并存，直接导致高校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高校严重依赖政府的资金和政策。高校内部行政权力独大，运行行政化严重，学术权力式微。

二、二重逻辑：综合改革困境的原因分析

由此看来，高等教育治理结构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远未形成，还不能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组织，社会参与高等教育的路径和渠道仍旧逼窄，政府、高校、社会三者关系调整依然长夜漫漫。对此高教研究界有不同的解释，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种：第一，不成熟论。从高校的角度来看，政府一般认为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治理能力弱小，尚不具备承接权力转移的能力，高校治理能力成熟有待时机。“推进政府管理改革，核心要义是加快转变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同时督促基层和学校把权接住、管好，确保放而不乱。”以康晓光为代表，认为中国高校作为社会组织，发育还不成熟，不具备承担权力转移的能力，政府一厢情愿地转移权力是不会成功的。第二，控制论。从政府视角来看，高校就像水中的水瓢，政府管控严厉，高校就被压入水面以下，反之，就浮出水面。高等教育改革推进缓慢与否，完全取决于政府一方，高校基本无力。政府是

高等教育改革的主导方，办学自主权放不放，放多少，如何放，完全取决于政府的考虑，高校只有被动接受。第三，权力惯性论。熊庆年、李威认为综合改革主要由行政外力主导，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决定了高校对政府行政权力依赖严重，从而缺乏内生性改革动力。集体“搭便车”心理又纵容了这种权力惯性的生存空间，最后导致综合改革的路径依赖。

综合改革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改革思维出现路径依赖：将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动力全系于政府，高校、社会与利益相关者在改革中出于被动地位甚至缺位，这背后实际是一种高等教育统制的逻辑。这种统制的逻辑是政府的一种特权支配思维，它使得综合改革政策具有过渡性特征，办学自主权下放的方式更多的是“政策途径”，而非“法律途径”。

中国特殊国情和集权传统决定了这两种逻辑的交错并行，如果说治理的逻辑是考虑包括政府、高校与社会等多主体协同共治，从而优化配置高等教育资源，那么，统制的逻辑则要求对高等教育实行有效控制，使高校成为自己的帮手而不是异己力量，从而确保政府的政治统治不会受到挑战与威胁。这就是综改进展缓慢，原地兜圈的根本原因。统制的逻辑是以管控为出发点，强调有绝对的领导地位或权威，并依靠权势去统治、控制和管理资源。高等教育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实践证明，政府统制高等教育，只会使高等教育越来越缺乏活力，质量难以提高，多元化发展无望，最后导致“政府的失灵”。治理的逻辑是以信任和多元为基础，考虑资源的最大程度利用和共同合作。高校并非政府的附属机构，提供高等教育服务也并非政府的专利，对高等教育的治理，社会和利益相关者同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权利，唯有实现“多元共治”，高等教育发展才能稳步向前。

（摘编自2017年第6期《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本期编辑：胡文海、陈斌）